

我和我的祖国 新时代新使命新担当

他们的故事，也是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熊永新

海风吹衣，海浪翻涌，一艘从国外开往中国的货船飘摇不定。一对中国夫妇站在甲板上，热切地眺望着祖国的方向。这是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晚会保留节目——音乐剧《传奇》中的一幕，讲述的是该院已故研究员周延冲、黄翠芬当年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的故事。天清一雁远，海阔孤帆迟。海上漂

泊56天，夫妻俩终于踏上中国的土地。后来，他们进入成立不久的研究院前身军事医学科学院，分别在生化药理和分子遗传等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双双入选两院院士。作为全军第一对夫妻院士，他们是科学界耀眼的明星。星星点灯，那一艘船，载着一点星光冲破阴霾回到祖国，点燃军事医学科

研事业的一团烈焰，又散成满天星火。这些天，吴祖泽院士主持的国家重大专项课题进入关键阶段。吴祖泽，中国造血干细胞之父，宇宙间一颗国际编号为207809号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永久命名为“吴祖泽星”。浩瀚苍穹，“吴祖泽星”并不孤独。建院时期的元老蔡翹，是我国生理

学奠基人，航空、航天和航海医学创始人，著名医学教育家。经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批准，国际编号为207681号小行星被命名为“蔡翹星”。蔡翹的名姓，不仅光耀太空，甚至印刻进每个人的大脑——他第一个发现视觉与眼球运动功能的中枢部位，国际学术界将这块脑区命名为“蔡氏区”。

航船驶过70年，这个研究院已经成为中国军事医学研究的“旗舰”，满载熠熠星光。航船驶过70年，承载着中国人民伟大梦想的中华巨轮，距离伟大复兴的彼岸越来越近。军事医学研究院的航船，是中国科学巨轮的缩影。军事医学研究院从无到

有、发展壮大、铸就国防国家盾牌的故事，是一群赤子不忘初心、心怀家国、奋斗、创新、奉献的故事。他们的故事，也是中国故事。

记者手记



第500期

星光满船 梦满帆

——解读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群体的精神图谱

■本报记者 熊永新 特约记者 庄颖娜

特稿

船

一艘艘航船，载着一颗颗火热的报国心驶抵祖国的海岸。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一艘船，改变了周延冲、黄翠芬夫妻的人生方向。一艘又一艘船，影响了中国军事医学发展的方向。

或历经险阻，或抵住诱惑，一批批专家学者先后返回祖国。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瑞士……一张张世界地图上，他们归来的航迹如一道道光线，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

终点的高光之处，正是当年刚刚组建的军事医学科学院。

改革开放后，留学热再起。据统计，军事医学研究院先后有4000多次出国学习交流。学成之后，他们的航迹如燕子归巢……

曾有人问黄翠芬当年为什么回国，她淡淡地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回国更加不需要理由。

和前辈回国面对的一穷二白截然不同，今日归来的年轻人，拥抱的是条件优越活力迸发的科研沃土、干事创业成就梦想的巨大舞台，遇见的是伟大复兴不可阻挡的新时代。

“无论政策制度、环境条件、技术支持还是学科支持，都是第一流的。”一位年轻“海归”告诉记者，“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给我们提供了能干事、干成事、成大事的历史性机遇。”

昨天那艘归船，海外游子归心似箭。今天这片征帆，戎装学者从容自信。由贺福初院士领衔的“人类肝脏蛋白质组计划”，形成了领先世界的优势，使中国成为该项国际研究计划的主席国。计划启动初始，共吸引18个国家和地区、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100多位中外科学家参与。

2015年5月，陈薇团队研发的埃博拉疫苗赴疫情最严重的西非国家开展临床试验。2017年10月，该疫苗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新药证书和药品批准文号，成为全球同类疫苗中首个获



26名两院院士，50多位军事医学学科奠基人和著名科学家，500多名高级专家和百余名国家级中青年人才……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人才队伍薪火相传，血脉相承，生生不息。

本报记者 邵龙飞摄

批生产的新药……

星

庞大的星座中，有很多看不见的巨星，它们光芒四射，却并不在人们的视野

大院绿荫掩映处，碧波天光云影，回廊曲径通幽。

一抬头，就能看见垂檐悬挂的一幅幅科研专家挂像，乳白色的射灯下，星光熠熠令人惊叹——

26名两院院士，50多位军事医学学科奠基人和著名科学家，500多名高级专家和百余名国家级中青年人才……

星斗满天，光芒四射。然而，有一些巨星，却并不在人们的视野。

那一次，一位上海来的客人，阴差阳错敲开老教授宋鸿锵的门，不由怔住：“宋鸿锵？你……还在？！”

宋鸿锵曾经是活跃在学术讲坛的医学专家，论文专著颇有影响，并兼任上海化学和药学会的青年理事。正当在学界备受瞩目时，宋鸿锵却从讲坛突然消失了。

敲门的友人，是当年上海药学会的秘书长。老秘书长无法理解：当年才华横溢的年轻理事，几十年来一直从事医学研究，为何至今默默无闻？

他不知道，这些年宋鸿锵在科研上早已取得重要突破，研制出国际领先水平药物。组织上推荐宋鸿锵参评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天，宋鸿锵把一张空白的申请表送了回来……

由于军事医学研究的高度保密性，许多人对自己的工作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

和宋鸿锵一样，柳支英、周金黄、张其楷、蒋豫图、邓蓉仙、李逸民等被称为“无冕院士”。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徜徉于大院东南角的军事医学博物馆，记者偶然从一幅合影照片中发现一张熟悉的面孔——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照片中的屠呦呦风华正茂，脸上洋溢着自

信的笑容。彼时，她作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的一名科研人员，刚刚加入“523”项目。

照片中的屠呦呦，如今已名满天下。而参与“523”项目的众多科研人员，却不为大众所知。参与者之一周义清教授直到离休，仍然是一名副研究员。

有人为周义清惋惜，有人感到不解，鲜有人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

上世纪60年代，正是周义清冒着枪林弹雨在疟疾肆虐的战场调研，归来和同事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不久后，“523”项目启动。

此后，他长时间工作在疟疾高度流行区，先后6次感染疟疾。每次徘徊在死亡边缘时，唯一鼓舞他的就是：“我不能死，我还没有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魂

这里没有单纯的“个人奋斗”，没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有大写的“家国”

研究院至今珍藏着两张来自战场的照片——

一张是在朝鲜战场，专家柳支英正在给官兵讲授吸血昆虫防护知识。这堂课结束后，他乘坐的车为躲避敌机轰炸翻倒，他断了好几根肋骨。

一张是在西南战场，一间用茅草和竹竿搭成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用显微镜观察刚刚捕获的蚊虫。观测完毕、收拾仪器，他们前脚刚刚迈进草棚，一架敌机投下炸弹，草棚夷为平地。

因战而生、为战而研，他们把论文写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

研究员王德文，全程参加我国核武器生物效应研究的科研人员之一，经历了当年的核试验。当惊雷动地，蘑菇云在大漠升起时，王德文和战友们穿着防护服冲向爆心，回收动物样本……

研究员王德文，全程参加我国核武器生物效应研究的科研人员之一，经历了当年的核试验。当惊雷动地，蘑菇云在大漠升起时，王德文和战友们穿着防护服冲向爆心，回收动物样本……

洒尽春秋热血，写尽肝胆忠诚。战时特种武器伤害的医学防护研究成果，把我国核、生、化伤害医学防护研究推到国际领先水平，当年与“两弹一星”一起震撼世界，同获首次颁发的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前前后后，研究院有数千名科研人员隐姓埋名投身此项研究，获奖时上台领奖

的不过7人，署名也仅22人。

研究院仅一个团队研制的一种药物，如今产值逾百亿，成就多家大公司。业内人士介绍说：“按照地方同行的回馈机制，他们早就身价亿万了。”科研人员不经意间也会用“亿万富翁”相互打趣，只是这个充满“含金量”的词汇，在这里只是个“说说而已”的玩笑。

计利要计国家利，留名要留集体名。他们争的，是一口气。

那年突发禽流感疫情，国家发改委紧急向世卫组织唯一指定的某国外公司订购特效药物“达菲”，得到的答复却是：4年以后才能供货，且供货数量远远低于我们的需求。

“一个十多亿人口大国的公共卫生安全，绝不能受制于人。”研究院李松团队日夜以继日奋力攻关，及时成功研制出抗人禽流感特效药，一举摆脱了依靠国外供应的局面……

树

根脉相连，枝开叶散，浓荫蔽日的树冠之上，夏花似锦、秋实压枝

研究脑科学的吴海涛，微信昵称“脑海”。

交流中记者发现，吴海涛对于数字有着很强的记忆力，各种数据信手拈来。“蔡翹教授出生于1897年，我出生于1978年；他的生日是农历九月十六，我的生日也是农历九月十六。”“脑海”的几组日期数字，有着奇妙的关联，“1978年，也是神经生物学研究室成立的那一年。”

吴海涛是蔡翹的“再传弟子”，其导师范明研究员恰是蔡老的关门弟子。神经生物学研究室，是吴海涛目前执掌的某研究室前身，研究方向正是从蔡翹开辟的学术领域延伸而来。

对数字异常敏感的吴海涛坚信，日期的巧合中隐藏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的必然。

在研究院，这样的师承关系已经延续数代人。

那是一个流传至今的美谈。图书馆里，一位年轻人接到朱王葆递来的一份关于造血干细胞辐射损伤研究的国外文献，从此找到终身求索的方向。这位年轻人就是吴祖泽。

多年以后，黑海之滨的国际医学会议上，已成为国际辐射研究协会首任中国理事的吴祖泽，介绍了他和同事们对

急性放射病的救治工作情况，立即得到各国专家广泛关注和赞誉。

他们的学生裴雪涛，仍在从事着干细胞和再生医学研究，探索着人工造血的前景，憧憬着医院不再闹“血荒”，规划着未来战场上的野战血液工厂……

这是学术上的薪传火继，更是精神上的血脉相承。

王德文今年81岁了，每天仍然骑着电动车穿梭于宿舍和办公楼、实验室之间，一头银发随风飘逸，人称“银发骑士”。他的实验室，总是到凌晨才熄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工作起来有“三个一样”：周末平时一个样，白天晚上一个样，雨天晴天一个样。

“我的拼劲儿，是受刘雪桐‘沾染’的。”王德文用了个核试验专业术语。虽然早已远离了“蘑菇云”，但那一幕至今印刻在王德文的脑海——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当时的技术负责人刘雪桐一挥手，率先走向离爆心最近的第一布点……

今天，这股子拼劲儿又“沾染”了年轻一辈。研究员彭瑞云是王德文招收的第一个博士。前段时间网上热议“996”工作制，同事笑称比不上“彭瑞云工作制”。那时，彭瑞云怀孕已经8个多月，还风风火火去野外开展实验……

这，还是一种枝连理结的传承。

“只有3次！”研究员李锦翎掰着手指，数出20多年里导师秦伯益院士表扬他的次数。秦伯益为人和善，唯独对李锦翎苛责有加。这让李锦翎很长时间既纳闷又郁闷。直到有一天，秦伯益向别人说起：“我可以放心退休了，因为我选好了接班人。”

那一刻，李锦翎终于明白，秦伯益是把他当成了又一个自己。

后记

科研办公楼前，老一輩种下的树苗，如今早已主干参天，绿荫铺地。

宋鸿锵终身没有参评院士。鲜为人知的是，宋鸿锵参与的科研成果当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后来，宋鸿锵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再后来，宋鸿锵的大儿子宋崇谦也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韩婧妮，小时候是“蚊虫王国”新疆北湾边防连所在团的一名军娃，常听父亲说起军事医学研究院科研人员“引蚊上身”做试验的故事。有一次，韩婧妮见到了这些科研人员。她觉得，这群人就是她想象中科学家的样子。

童年时代的第一印象，奇妙地决定了人生方向。大学，韩婧妮选择了生物专业。毕业后，她考取了军事医学研究院的研究生。硕博连读后，韩婧妮留院工作，成为研究院的一员。

彭瑞云觉得，女儿谭彭丞很多方面像极了自己。2岁时还不识字，谭彭丞就能照着彭瑞云修改论文的样子，在小药盒上画出各种编辑删改符号。

如今，谭彭丞以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录取，读的也是药学专业。对于未来，谭彭丞有明确的规划：刻苦钻研，用知识回报祖国。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干细胞，通俗地说就是能够分化出不同细胞的种子细胞。”研究干细胞的裴雪涛向记者科普。

大院也是一个“干细胞”。研究院人的精神，像干细胞一样生长扩展，向部队、家庭、学校和社会渗透浸润，影响一代又一代人。一个院的传统，终将熔铸于一支军队的品格、一个民族的性格、一个国家的气质。

自我更新、多向分化，干细胞蕴藏着无穷的生命力量。一枚枚这样的红色“干细胞”汇聚、增殖、繁衍，造就的必将是一个精神丰沛、生机勃勃的新时代！

有了这生生不息的力量，向着复兴彼岸航行的中华巨轮，势不可挡！

把个人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

■张士涛 江勇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离！”

军事医学研究院近70年的创业史，就是军事医学科研事业服务祖国和人民的奋斗史。一代又一代科研人员把个人的小我融入祖国的大我，把青春、汗水甚至生命，熔铸在“姓军为战、强国为民”的不朽丰碑上。

当前，军事科研体系已重构重塑，军事科研“航母”正扬帆启航。驶出新时代的“强军航迹”，我们更加需要高举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培养和锻造一支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的高素质军事科技人才队伍。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闻大漠，驻戈壁，义无反顾；冲爆心，踏毒海，舍命前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无论是远行归来的莘莘学子还是名扬四海的科学精英，无

不心甘情愿地抛家舍业、隐姓埋名，用赫赫军功、铮铮铁骨诠释了了对祖国的热爱、对人民的忠诚、对使命的担当、对道义的坚守。启航新时代，我们要始终把科学报国作为人才培养的精神内核，教育和引导广大科研人员把爱国情、报国志融入科技兴军的伟大事业之中。

创新不易，引领更难。从在西方国家严密封锁下艰难起步，到领衔国际科研合作计划；从搭茅草棚做实验，到拥有世界领先的蛋白质组学科研平台；从“神农尝百草”式的药物筛选，到建立完备的“三防”医学救援体系……军事医学科研人员以敢为人先、矢志卓越的创新实践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历史性跨越。

站在新起点，我们要坚持把引领创新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标尺，教育和引导广大科研人员，勇立高科技的

时代潮头，干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使命的业绩。

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面对亲朋、同志们的不解，老专家宋鸿锵反问：“一个人做了工作非要受到社会承认吗？农民种出的粮食，是不写他们名字的。”在攀登科技高峰、探索生命奥秘的征途上，一代代军事医学科研人员不为名利所诱、不为流言所扰，锲而不舍，默默耕耘。

踏上新征程，我们要继续把淡泊名利作为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教育和引导广大科研人员把攀登世界高峰与坚守精神高地统一起来，把个人的力量融入祖国富强、民族复兴伟业之中。

锐视点

